

## 乡村振兴唤醒农民对文体生活的热爱 村赛勃兴催生“洋外援”“野球经纪人”



一名外援选手(左三)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乡村篮球比赛中上篮。  
新华社记者王鹏摄

本报记者张典标

曾任北京大学男子篮球队队长的王璵,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村里与 NBA 球员一较高下。

2022 年夏天,贵州黔东南州台盘村篮球赛走红网络,在线观看人次累计破亿。网友将其加封为“村 BA”。在“村 BA”冠名前十多年,王璵已活跃在全国各地农村的篮球场上。

英语流利的王璵聚齐一帮“洋外援”,每年带他们奔赴五六十个地方比赛,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犄角旮旯。

老外与老乡,相遇在球场。这个在外人看来有些魔幻的搭配,却是很多中国乡村习以为常的体育活动。

“土洋”结合的“村 BA”,已经在 2022 年成为乡村振兴“最具人气”的鲜活注脚。

### “村 BA”决赛迎来 NBA 球员

“国际篮球公开赛”不是城市的专利。2008 年,在村里的篮球场上,大屯村农民朱光胜第一次见到了老外。

这个贵州安顺市平坝区的小山村,当时不少人最远只去过县城。

87 岁的朱光胜至今记得,村里的水泥球场被围得水泄不通,看台上座无虚席,屋顶、墙上、场边的树上都是人。老外一亮相,整个球场都骚动起来。不少村民还兴冲冲地跑去和老外比身高。

被称为 CBA 最强外援的李·本森,就是那一年来到大屯村的。这位美籍球员曾效力过多支中国职业球队。淡出职业赛场后,他成了乡村篮球场上的常客。

14 年后,朱光胜仍记得这个高瘦的黑人外援,笑得憨,轻而易举帮球队夺冠。

如今,在农村看老外打球已不是新鲜事,洋外援进村现象越来越普遍。

一份调查显示,2020 年除贵阳外,贵州其他地州市的“村 BA”均引进过洋外援。

2017 年在全国百强县福建石狮市,一场“村 BA”决赛中,对阵双方邀请了 15 名 NBA 球员。石狮市篮球协会会长李大杰说,村民可以像下菜单一样,委托协会请到看中的外援。

6 年前,在曾经“苦瘠甲天下”的西海固,宁夏海原县一场乡村篮球赛中,也出现过 13 名洋外援……

更有趣的是,清洋外援也不一定稳拿冠军。2019 年,在广西横州乡镇篮球赛上,有 34 名洋外援参赛。平明镇和峦城镇都请到了 NBA 球员,没想到前者只拿了第五名,而后者八强都没进,一个外援没请的百合镇却拿了第四。

平明镇篮球协会会长黄均满还犯嘀咕,洋外援是不是放水了。由于村里篮球场上“星光”璀璨,一些网友公开戏称:现在“村 BA”比 CBA 还牛,是最接近 NBA 水准的比赛了。

“我们村的比赛叫国际公开赛更合适。”朱光胜的孙子朱勤松,现在是村里篮球赛组委会主席。他一口气列出十多个来村里打过球的洋外援。朱勤松告诉记者,每年 70 多支球队参加的大屯村篮球赛,外援最少有二三十名,其中洋外援不下十个,剩下的大都来自高校和 CBA 等国内职业赛场。

有段时间培训机构的外教和留学生,也“冒充”职业球员混迹其中,外援想上场,要提交一段打球视频,证明自己的实力。一度“村 BA”赛场上全是外援,当地人没机会上场。这种现象多了以后,一些村开始限制外援参赛的数量。

大屯村规定参赛球队只能请三个外援,每次最多两人上场。朱勤松说,职业联赛也有类似规定。2 名外援带 3 名村民(以下简称“2 带 3”)的组合,更有利于提高本地球员水平。

如今在石狮,“2 带 3”也是普遍规矩。不同的是,这里限制外援人数,为的是平衡两支球队的实力。双方旗鼓相当,比赛才有看头。李大杰自比为村赛“中介”,为村里找外援搭班子。

### 村民变市民,寻找新的引潮力

记者在航民村蹲点调研期间,正赶上钱塘江观潮的最好时节。

“弄潮儿向涛头立,手把红旗旗不湿。”在钱塘江南岸的航民村看来,这个号称“世界三大潮汐”的天下奇观更像是一个隐喻。

走在华灯初上的航民村街头,脑海里不时浮现出被村民们抽象过的太阳、月亮

也有一些村为了保持村赛的原汁原味,一律把外援拒之门外,凭当地户口才能参赛。百合镇篮球协会副会长莫世恒担心,外援上场,“村 BA”还姓“村”吗?

### 一直在路上的“野球”经纪人

与洋外援在乡村球场上竞技时,王璵没想到自己会转行成为经纪人。

“圈里老外我没有不认识的。”在“村 BA”这个词诞生之前,人们习惯把村办篮球赛归为“野球”,其中不乏贬义成份。

王璵作为最早一批“野球”经纪人,算得上是乡村赛场上的“头号玩家”之一。

早在 2009 年,他就踏上乡村篮球赛的“奇妙旅程”。当时 CBA 还没有选秀机制,大量大学生球员没有进入职业球队的正式通道。

在远离职业球队的乡村,王璵第一次有机会和国内外职业球员一较高下。

王璵告诉记者,一个打得好的“野球”球员,靠奖金和出场费可年入百万。职业球员每场比赛出场费,为四千元到一万多元不等。初露头角的大学生球员,普遍没有出场费,只有赢球的奖金。即便是经济欠发达的贵州,冠军奖金上十万的乡村篮球赛并不鲜见,奖金一两万的小型村赛早已司空见惯。

有知情人透露,一些大学生球员想要打“野球”,得先向校篮球队交够 4000 元的“出门费”。即便如此,不少大学生球员一到赛季,依然争先恐后往村里跑。

王璵估算,一个“野球”球员一年挣的钱可能比职业球员还多,“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”。

“村 BA”的吸引力已超出国界。随着赛场上的洋外援越来越多,王璵索性从一名“野球”球员变身为“野球”经纪人,专门为他们沟通协调各种比赛事宜。

今天还在北京的王璵,几天后可能出现在 1000 多公里外的乡村,身后领着几位洋外援。朱勤松手机里也存着六七个“野球”经纪人,“每人底下都有上百个外援”。

各地办赛的源头很多,有春节、高考升学、老人过寿、新屋落成……有大有小,五花八门,一直从春节持续到十月份。

2016 年,王璵以洋外援为主角拍摄“野球”纪录片《随波逐流》。在他的镜头里,乡村篮球赛土气中带着洋气,洋气中透着野性。乡村篮球赛有多野,走南闯北的王璵有足够的发言权。

在贵州一个山村,王璵带着洋外援在铺着煤渣的泥土球场上打过比赛,球一拍

扬起一阵灰。三分线、底线画得也不标准,有些地方连脚都搁不下。

这是王璵打过“最烂”的一个球场。后来他在四川,还住过一个自带宾馆的球场,“比北大的球馆都好”。

“野球”经纪人的职责并不限于球场。从最初与当地球队的联系沟通、交通食宿,再到打球、费用结算,任何环节的意外,都会影响既定的赛程和球员收入。一场原该如期进行的球赛,被突然取消、延迟或者提前……各种突发情况,王璵都经历过,“在节骨眼上,你必须据理力争,维护球员”。

“东南地区的赛事流程非常成熟,从落地到打球不用花费太多精力沟通,赛后也没有唱歌喝酒等社交活动;西北的场地条件差一些,西南山区单场给的钱少,但场次多。”王璵估计,七八成的洋外援都活跃在东南沿海。

流水的外援,铁打的观众。下到孩童上到老翁,这些很少缺席的乡村球迷,见过的球星,不一定比城里人少。王璵镜头里不变的是狂热的球迷。

有一回,在贵州乡村的篮球场边,一个老大爷抽着水烟,和王璵唠嗑——场上谁打得强,谁的球技好,甚至几年前哪个外援来过,打得如何,大爷都讲得头头是道。

王璵甚至觉得,乡村球赛比城市街球更接近职业球赛。街球注重表演,而村里的球场上,实力才是硬通货。“你老赢不了球,下次就不请你了。”

2 年前,中国男篮在一次比赛中输给委内瑞拉。王璵在微博上发的一条视频中说,“一些球员应该跟我去打野球,我们去山里、我们去村里……”

### 隔着电视屏幕给 CBA 吹哨

年过花甲的朱玉昌笑称自己是兽医里最懂篮球的。

他在乡镇畜牧兽医站干了一辈子,却以全镇唯一的二级裁判的身份,在大屯村的篮球场上意外走红。

朱玉昌习惯用夸张、生动的肢体语言,重现球员犯规动作。有人将他手舞足蹈的判罚动作发到网上后,贵阳的观众慕名驱车 70 多公里来一睹风采。

这些极具特色的判罚动作,源于朱玉昌 40 年的村赛裁判经验。这套让农民一眼就懂的姿势并非华而不实,反而一次次命中“要害”。职业球员篮下拼抢的违规小动作,照样逃不过老朱的眼睛。

热闹的赛场上,他是最冷静的那个人。

物质财富,只能通过多元投资布局来弥补。

高天相坦言:“我们印染和热电企业的利润,占整个集团六成还多。为了破解产业结构落后等问题,除了打造黄金饰品加工业,我们还投资一些新能源、高科技企业等。”

在瓜沥镇原党委书记李国平看来,航民村的整体建设与城市无异,但仍沿用农村的管理体制,已经遇到农民变市民、工业园区腾挪发展的问题。瓜沥镇要继续发展,也面临土地制约的问题。

“政府方面考虑在钱塘江畔的一个区块,为航民村谋划 750 亩的产业腾挪地,”李国平说出政府的打算,并设想镇里可以从中拿一部分土地来搞开发,一部分留给航民村发展新兴产业。

除了外部的转型困扰,航民村内部改革也迫在眉睫。由于集体产权制度约束,他们在投资发展方面也面临不少压力。

“有时筛选项目宁愿错过,也不愿错投,集体资产我们不敢亏,也亏不起。这

裁判情绪影响判罚质量,一个错哨,可能搅黄一场球赛。这些道理,从小在村里看球的朱玉昌无师自通。

自学成“裁”的朱玉昌,初中时就兼过校篮球赛的裁判。等到 19 岁读农校,他已在全省的篮球赛上吹过哨。

直到现在,他都舍不得错过任何一场 CBA 球赛。他边看球边给电视里的球员吹哨,比较自己和现场裁判的差距。“由于电视直播的视角比现场还清楚,有些犯规,我吹得比现场裁判还快。”

小有名气的朱玉昌每年春节的“裁判档期”,从初五排到元宵节。邀请太多忙不过来,现在他只接决赛。即使这样,还得提早一个月才能预定上。

在贵州不少地方,篮球赛成了春节的“标配”。“很少有像篮球赛这样的活动,能聚集全村男女老少,也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。”朱玉昌认为乡村篮球火爆,主要是因为“篮球的场地和技术门槛低,找块空地就能办”。

1953 年,大屯村的第一场篮球赛,就是在泥土地上比赛。木板钉的篮板,铁圈凑合当篮筐。没有统一的球服,乡亲们就用粉笔把号码画在背上和屁股上。当时赢球还能记工分,输球的得干活。

1982 年,朱玉昌第一次吹村赛,泥土变成了水泥场。自制的铁皮篮板代替了简易木篮板,当年还是稀罕物的自行车、彩电、冰箱也陆续摆上领奖台。

1994 年,大屯村篮球场边第一次摆出 2000 元奖金。“那时电视机、彩电不再稀奇。”朱玉昌解释,“对球队来说,给奖金也比给一台电视机好分。”

2 年前,大屯村篮球赛搬进了投资过百万的室内新球场。这是村民第 6 次自筹资金修建球场——地面铺上了塑胶,篮板换成了带自动计时的全钢化玻璃,坐得下 6000 多人。

“村里的球馆安装了雾化降温系统和音响系统,条件不输市里。”朱玉昌说,“很多外援看到新球场,都吃了一惊。”

一个个“退役”的老球场,记录了乡村振兴的脚步。大屯村一年一个样,而朱玉昌的哨声一直没断。站在新球馆里,看着乡亲们和洋外援、CBA 球员一起拼抢,听着观众的呐喊,朱玉昌觉得吹“村 BA”和吹 CBA 也差不多。

### 靠“众筹”的球赛“断奶”了

从去年开始,朱勤松不用再挨家挨

户“众筹”办球赛了。

发奖金、请外援都需要钱。奖金由主办村出,外援由球队自掏腰包。乡村篮球赛从“出生”那天起,全部费用就靠村民自筹和外出“化缘”。

朱勤松算过一笔账。2019 年,持续近一个月的村办篮球赛花了 20 多万元,光淘汰赛和决赛的奖金就 14 万元。

“周边村寨也办篮球赛,大屯村出的奖金少了,谁还来?”朱勤松担心办了近 70 年的球赛,断送在自己手里。

朱勤松并非杞人忧天。记者了解到,广西有些村子因为总筹不到钱,篮球赛人气清淡,球员都被挖走当外援。

大屯村篮球队也找过 CBA 球员当外援。为了省钱,直到半决赛外援才上场。“一共 5 万元的冠军奖金,外援出场费和奖金花了 1 万元,再扣除吃住和服装开销,只够保本。”

为了筹钱,朱勤松每年提前两三个月,就找村民“化缘”,到区里找熟悉的企业拉赞助。大屯村支部书记朱裕鹏告诉记者,全村 2000 多人凑出十五六万元,再加上企业资助,有多少钱就办多大的比赛。不够时,村干部还得多贴钱。

没承想,2020 年答应赞助的企业拿不出经费了。“即使给了钱,村里也提供不了发票,不方便别人报账。”第二年,被逼无奈的大屯村成立公司运营球赛,尝试“以球养球”的市场化方式办赛。

“我们也不想每次都劳师动众,变相给村民添负担。”大屯村篮球赛每年都有上万观众,朱勤松大胆提高奖金额度,尝试“线下卖票,线上付费直播”的模式。

“冠军奖金有 10 万元,总奖金超过 20 万元。”朱勤松想通过奖金吸引球队和外援,提高球赛质量,吸引更多观众。

贵州不少村赛是不收门票的。第一次吃螃蟹的朱勤松心里没底,村里事先留了退路。大屯村拿出 20 万元,再加上贷款,凑了 40 多万元,“万一观众不乐意买票,就改成免费”。

开赛当天,高额的奖金吸引了比以往更多的外援,一些网红球员也慕名而来。线下门票 10 块钱一晚,每晚都有 3000 人以上观看。

线上付费直播,初赛免费,复赛五元,决赛十元。最热闹的一次有 13 万人在线观看,多半是贵州球迷和在外务工的村民。那一年,决赛打了三次加时才分出胜负。意犹未尽的观众,还在直播间里打出弹幕:“这门票太值了。”

2021 年受疫情影响,大屯村篮球赛只打了 13 天。比赛期间,村里 600 个车位一个没闲着,60 多个摊位叫卖声不断。每家一晚挣两三千元是常事。停车费和摊位费一晚也有数万元。总共 70 万元的球赛收入,30% 归集体,70% 归村民分红。

朱勤松估计,如果每年办夏冬两季比赛,总收入 300 万左右,球赛将成为集体收入中贡献最大的产业。

令人诧异的是,市场经济发达的石狮,球赛却不收门票。村里不愁没赞助,当地运动服装企业多,赞助篮球赛脸上有光。

更有意思的是,台盘“村 BA”火了之后,也有贵阳的企业愿意冠名赞助,却被拒之门外。

拒绝企业赞助的台盘村支部书记张寿双,也为办赛经费发过愁,照样得广撒网,找饭店、小卖部和煤矿赞助,但效果不如意,一家宾馆只给了 20 块钱。

“20 块钱能干嘛呢?”无可奈何的张寿双贴出捐款名单后,那些捐了五块、十块的店铺偷换自己名字抵掉了。

张寿双担心企业投钱后,村赛会变成挣钱的工具,“万一收起门票,谁还来?到时候寨老要骂的。”

一番讨论之后,台盘村规定:球场一直露天开放,不收门票,不做商业出租。除了每年原有的比赛之外,只接受政府部门安排的赛事。

不过,对于赛场周边摊贩的运营,张寿双倒觉得可以引进资本,“毕竟有时候村委会顾不过来,也没有这方面的实力和人才。”

“航民村的政策不能几十年不变,未来如何将死的股权变成活的资本,正是我需要思考的问题。”朱重庆的神情凝重起来。

李国平的父亲曾任航民集团下属企业负责人,他自称是半个航民村子弟。对如何处理集团公司与航民村委会的关系问题,他也有更清醒的认识:不能“企业大党委、航民小村委”,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强党建,将这种格局改变过来。

群众对干部最重要的是信任,这种信任也随着年轻一代村民的成长而变化。“航民村创业 40 多年,老百姓对朱重庆很放心,等他退休了,还会不会这么放心?我们也不敢保证。”陈国庆说。

面对这些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,朱重庆缓慢而有力地說:“未来,航民村需要刀刃向内的自我改革。好比一个鸡蛋,从外面打破的是死亡,而从里面打破的是新生。我们不能赢了对手,却输给时代!”